

附錄二：金學研究與中國現實主義思潮之流變

本文將「採取現實主義角度評價《金瓶梅》」此一研究取徑，置於學術史及思想史的脈絡中，梳理造成各時期金學研究者對「現實主義」理解不同的意識型態背景；並藉由具體分析相關金學研究論文，探討此一取徑對金學研究產生的影響。

一、 金學研究與五四時期的「現實主義」

在 1933 年及 1934 年，鄭振鐸及吳晗分別於〈《金瓶梅》的著作時代及其社會背景〉、〈談《金瓶梅詞話》〉兩篇金學研究的重要著作中，論及《金瓶梅》是「很偉大的寫實小說」，是「一部現實主義作品」。¹鄭、吳二氏之研究取徑，奠基於五四時期引介西方文藝思潮的知識份子，對現實主義的普遍肯定。由於五四時期崇尚科學、實證，能與科學精神之內涵結合的現實主義，便在文藝思潮中佔據領導地位。陳獨秀、茅盾、郁達夫、梁啟超等人，皆曾為文論及科學與現實主義之間的關連，在於「即真即美」：因為具有現實主義特徵的作品，和科學一樣以「求真」為最終目標，能夠冷靜、客觀地分析社會的問題，揭露人生的真相。對五四時期的知識份子而言，在文藝上崇尚現實主義，可謂將現實主義視為科學方法在文藝上的表現，二者同為解決社會問題的途徑。²

由於推崇現實主義具有「改革文學」的實際目的，在現實主義傳入中國的初期，陳獨秀對現實主義的詮釋，便已和西方現實主義思潮有所區隔。陳獨秀並非因為現實主義具備「反資本主義特質」或者得以「反撥浪漫主義」推崇其價值，而是以現實主義為「變古之道」之一，能推倒陳腐的古典文學，使人心社會劃然一新。陳獨秀所謂的「現實主義」雖然與其原意不盡相同，但指涉的範圍仍然相當廣泛：凡是以「求真」為目的，能夠表現「科學性」和「客觀性」者，皆屬現

¹ 二文皆已收入胡文彬，張慶善選編，《論金瓶梅》（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4）。引文見頁 50、11。

² 參見俞兆平，《寫實與浪漫—科學主義視野中的「五四」文學思潮》（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1），頁 72-81。

實主義文學的一部份。

但是在 1927-1929 年出現「革命文學」論爭後，知識份子對現實主義的認知，便逐漸出現分歧。受到蘇聯革命勝利後的文藝論戰影響，郭沫若、成仿吾等創造社作家相信，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能建立美好的未來。其實此一主張本身，理想主義、浪漫主義的色彩遠大於現實主義；但在唯物觀的制約下，當時的主流文學家視之為現實主義的一部份，也使當時的文藝思潮與蘇聯相同，進入由「批判現實主義」轉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過渡期。主張「革命文學」的作家與五四時主張「批判現實主義」的作家根本上的差異，即前者以為，文學寫作應以無產階級的立場為出發點；僅僅表現社會生活並不足夠，唯有將階級的期望或經驗，透過形象化的組織化為文學，並注重文學宣傳及認識的功能，才能稱之為優秀的文學作品，也才能稱之為對「現實主義」理解正確的文學作品。此際魯迅、茅盾及馮雪峰等人是主張「革命文學」者主要論爭的對象，因為較諸階級鬥爭，他們更重視生活和藝術創造本身，而且認為文學服務的「人生」指稱的是民族思想的啓蒙與更新，而非有明確政治目的的階級革命。因此，承認「超越階級觀」的「客觀真實」存在與否，以及認為「現實主義」的功能究竟是「暴露黑暗」或是「表現階級」，成為推崇「革命文學」的作家與五四時期著重「反映生活的現實主義」的作家間論爭的焦點：不僅是創作方法意義上的對立，更是文藝性質與功能意義上的對立，涉及不同文學家的政治立場問題。³

上述對現實主義理解的分歧，在鄭振鐸及吳晗對《金瓶梅》的研究中，皆可略窺一斑。在當時文藝思潮的影響下，鄭振鐸相當推崇《金瓶梅》中「真實」的特質，甚而認為《金瓶梅》「偉大似更過於《水滸》，《西游》、《三國》，更不足和它相提並論」；正因為他認為除了《金瓶梅》以外，其他小說中的「英雄」並不真實，可謂早已遠離生活，因此價值不若《金瓶梅》。⁴鄭文也認為，《金瓶梅》揭露了中國社會的黑暗面：

在《金瓶梅》裡所反映的是一個真實的中國的社會。這社會到了現在，似還不曾成為過去。要在文學裡看出中國社會的潛伏的黑暗面來，《金瓶梅》

³ 參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在中國的接受與轉換》，頁 15-24。

⁴ 參見鄭振鐸，〈談《金瓶梅詞話》〉，《論金瓶梅》，頁 49。

是一部最可靠的研究資料。⁵

由引文可知，鄭振鐸不僅認為在《金瓶梅》中可以看出「中國社會潛伏的黑暗面」，而且這個社會「還不曾成為過去」。以強調《金瓶梅》中的「寫實」能夠「暴露黑暗」此一角度而言，鄭氏的觀點比較接近五四時期「反映生活的現實主義」；鄭氏評價《金瓶梅》中「潛伏的黑暗面」時，也對社會表現出「啓蒙」的精神和意圖。因此在他的論述中，除了評論《金瓶梅》本身的內容外，更將《金瓶梅》中「充滿了罪惡的畸形的社會」與自己身處的社會現況相連結⁶，最後作出以下論斷：

《金瓶梅》的社會是並不曾僵死的；《金瓶梅》的人物們是至今還活躍於人間的，《金瓶梅》的時代，是至今還頑強的在生存著。我們讀了這部被號為「穢書」的《金瓶梅》將有怎樣的感想與刺激？……然而這書是三百五六十年前的著作！到底是中國社會演化得太遲鈍呢？還是《金瓶梅》的作者描寫，太把這個民族性刻畫得入骨三分，洗滌不去？像這樣的墮落的古老的社會，實在不值得再生存下去了。難道便不會有一個時候的到來，用青年們的紅血把那些最齷齪的陳年的積垢，洗滌得乾乾淨淨？⁷

在論證《金瓶梅》中的社會「不曾僵死」後，鄭振鐸關注的是讀者讀了《金瓶梅》後「將有怎樣的感想與刺激」，以及「中國社會的演化」和「民族性」。鄭文以史料為基礎，推論《金瓶梅》的成書時代，目的即為論證社會現實與小說內容的關連，強調其「寫實」的特徵及價值；在五四崇尚以「反映人生的現實主義」改革文學，進而改革社會之際，他選擇突出此一特徵，就是希望文學評論能夠在

⁵ 〈談《金瓶梅詞話》〉，《論金瓶梅》，頁 49。

⁶ 鄭文中舉例道：「於不斷記載著拐、騙、奸、淫、擄、殺的日報上的社會新聞裡，誰能不嗅出些《金瓶梅》的氣息來。鄆哥般的小人物，王婆般的『牽頭』，在大都市裡是不是天天可以見到？西門慶般的惡霸土豪，武大郎、花子虛般的被侮辱者，應伯爵般的幫閒者，是不是已絕跡於今日的社會上？楊姑娘的氣罵張四舅，西門慶的謀財娶婦，吳月娘的聽宣卷，是不是至今還如聞其聲，如見其形？那西門慶式的黑暗的家庭，是不是至今到處都還像春草似的滋生蔓殖著？」見《論金瓶梅》，頁 50。

⁷ 〈談《金瓶梅詞話》〉，《論金瓶梅》，頁 50-51。

社會上產生一定的效應，進而改善「古老的墮落的」社會的積習與弊病。在鄭振鐸眼中，「寫實」的價值，並非藝術上的選擇與判斷，而建立在他對社會改革與民族啓蒙的理想之上。因此他評論的文字除了具有學術上的參考價值外，也流露出一部份對「革命」的期待。

較之鄭振鐸的評論，吳晗在一年後發表的文章，更具階級批判的意識，與主張「革命文學」者較為接近。爲了論證《金瓶梅》爲「現實主義小說」，吳晗詳考《金瓶梅》的成書與〈清明上河圖〉的關係，並以史籍記載與小說內容相互參照，論證《金瓶梅》反映了晚明社會的實況，成書年代在萬曆年間。證明社會現實與小說內容的關連後，他進一步論述：

《金瓶梅》是一部現實主義小說，它所寫的是萬曆中年的社會情形。它抓住社會的一角，以批判的筆法，暴露當時新興的結合官僚勢力的商人階級的醜惡生活。……透過西門慶的社會聯繫，告訴了我們當時封建階級的醜惡面貌，和這個階級的必然沒落。⁸

吳晗雖然也提及《金瓶梅》暴露了「醜惡生活」，但是鄭振鐸認爲《金瓶梅》寫的是整個「古老的墮落的社會」，吳晗則將焦點置於「結合官僚勢力的商人階級」上，而且認爲《金瓶梅》宣告了這個階級「必然沒落」。在以階級爲論述對象的基礎上，吳晗關注小說中所反映「地主剝削農民」；但這在《金瓶梅》全書中，並非主要內容。也就是說，在評論《金瓶梅》時，吳晗並非以小說的內容爲主要根據，而是先以自身的意識型態闡釋小說主旨，預設論述立場。在上述情形之下，才會出現「在《金瓶梅》書中沒有說到那時代的農民生活，但在它的描寫市民生活時，卻已充分告訴我們那時農村經濟的衰頹和崩潰的必然前景」這樣的見解⁹，這也是他在後文援引「地主擁有大部分田產」、「皇庄破壞農業生產」等史料，以證實上述推論的原因。對吳晗而言，《金瓶梅》之所以屬於「現實主義小說」，已經不全然因爲它具有「寫實」的特質，而是透過《金瓶梅》和史實之間的比對，不僅能論證階級之間的差異與消長，也能藉此推論因階級差異而爆發革命的必然性。¹⁰

⁸ 吳晗，〈《金瓶梅》的著作時代及其社會背景〉，《論金瓶梅》，頁 41。

⁹ 吳晗，〈《金瓶梅》的著作時代及其社會背景〉，《論金瓶梅》，頁 41。

¹⁰ 吳晗論及：「西門慶所處的就是這樣一個時代，他代表他所屬的那個新興階級，利用政治的和經

綜上所述可知，由於五四時期改革文學及社會的實際需要，切中時弊的現實主義，成爲鄭振鐸及吳晗評論《金瓶梅》時主要的思想背景，也實際影響了二者的推論。而對文藝性質認知不同的知識份子對「現實主義」理解上的歧異，也使時代相近的鄭、吳二文中，出現對《金瓶梅》不同的觀照。

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對金學研究的影響

前文已述及，五四時期至三〇年代對「現實主義」的理解，使左翼作家間出現意見分歧；因此當時的文藝工作者，相當關注由蘇聯引介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否能夠解決左翼文學理論上的歧異¹¹；此一理論亦引發了金學研究中對「現實主義」特質的爭論，尤以李長之及李希凡對《金瓶梅》的評論爲最，他們各自代表了當時所謂「右派」和「左派」的觀點。

自三零年代以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逐漸在「現實主義」的詮釋上佔據領導地位。但實際上在三〇年代至五〇年代初期，相關理論的引介仍然相當有限。雖然文藝工作者對理論本身並不熟悉，但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精神實質，已經透過四五〇年代左翼文學的理論說明、權威論述和政策規定表達甚多，並且落實到文學理論和創作實踐中。¹²毛澤東於 1942 年發表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

濟的勢力，加緊地剝削著無告的農民。在生活方面，因此就表現出兩個絕對懸殊的階級，一個是荒淫無恥的專務享樂的上層階級，……在這集團下的農民，……在他們面前只有兩條道路：一條是轉死溝壑，一條是揭竿起義。……這樣的一個時代，這樣的一個社會，農民的忍耐終有不能抑止的一天。不到三十年，火山口便爆發了！張獻忠李自成的大起義，正是這個時代這個社會的必然發展。這樣的一個時代，這樣的一個社會，才會產生《金瓶梅》這樣的一部作品。」由引文可知，「農民階級如何被壓迫」爲其理解《金瓶梅》的重要根據，此一推論的目的，是爲了證明階級差異「必然」能推動「起義」。見〈《金瓶梅》的著作時代及其社會背景〉，《論金瓶梅》，頁 44-47。

¹¹ 1930 年「左聯」成立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夠透過組織，整合不同的文學觀點。陳順馨認爲，當時左翼文學的理論問題有三：一、如何融合傾向性、真實性、主觀性與客觀性，解決世界觀與創作方法的矛盾，文學應該爲人生或爲革命而作？表達進步的社會共識時，如何防止創作公式化？二、表現無產階級現實主義之際，如何保留資本主義時期現實主義暴露和諷刺的功能？三、浪漫主義、現實主義、革命文學間的矛盾如何統一？參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在中國的接受與轉換》，頁 31-32。

¹² 例如即便到了五〇年代初期，文藝領導者周揚都還認爲，由於中國作家對馬列主義的修養、生

的講話〉，就明顯吸收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思想，代表了「現實主義」中「左派」的觀點。毛澤東認為文學應該寫「工農兵生活」以及「生活的光明面」，注重塑造「先進人物」和「英雄典型」；由於毛看重文學的功能和社會效應，因此他認為文學對生活的摹寫、加工並不足夠，而應該使文學作品「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¹³這些看法都與三〇年代引介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內容十分近似。例如「文學應該以『寫真實』為藝術方法的基礎，但『真實』不應該是日常生活瑣碎的重複，而應表現在『英雄典型人物』的創造上」；以及「文學應以『革命浪漫主義』為主要組成部分，並利用幻想和邏輯推理，達到表現社會主義憧憬」等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對文學的詮釋¹⁴，都透過〈講話〉，成為對當代中國文學創作、文學評論最具影響力的指標。〈講話〉及 1950 年起在文藝界發動的一連串批判活動¹⁵，可謂共同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限定了文學的政治社會功能，以及文學應該「寫什麼」、「怎麼寫」，形成了一統的文學規範；學習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也在五〇年代初期的文學界蔚為風潮。

由於政治、經濟的因素¹⁶，毛澤東在 1956 年 4 月 28 日擬定了「藝術問題上百花齊放，科學問題上百家爭鳴」的政策，鼓勵知識份子發表「各種學術思想」。在「雙百」較為自由、開放的政策下，以秦兆陽為首的部分文學界人士，才又開始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此一「一統的文學規範」展開反思，重新思考追求文學中「生活真實」與「藝術真實」的重要性，並且質疑是否有必要以「社會主義」

活經驗及藝術造詣仍然不足，造成此文藝主張在中國的發展不夠成熟。參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在中國的接受與轉換》，頁 83；洪子誠，《1956：百花時代》（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頁 170-72。

¹³ 參見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 12-13。

¹⁴ 參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在中國的接受與轉換》，頁 83。

¹⁵ 自 1950 年至 1957 上半年，文藝界的批判運動有：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1950-1951），對蕭也牧等的創作的批評（1951），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和胡適的批判（1954-1955 年），對胡風集團的批判（1955 年）。參見《中國當代文學史》，頁 36-38。

¹⁶ 毛澤東認為政治上推行社會主義相當順利，應該將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經濟及文化上；由於此舉需要大量知識份子的投入，因此毛決定推動「雙百」政策。參見《1956：百花時代》，頁 1-4。

限定「現實主義」的詮釋。¹⁷然而 1957 下半年「反右派運動」開始，秦兆陽等人的論調被批為「右派」，崇尚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者又佔了上風。¹⁸

觀點接近當時「右派」的李長之，便是在「雙百」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反思的背景下，於 1957 年 4 月《文藝報》第三期上發表了〈現實主義和中國現實主義的形成〉。這篇文章將中國文學中的「現實主義」分為「廣義」及「狹義」兩種，《金瓶梅》便是「狹義的現實主義」下的產物。¹⁹他認為《金瓶梅》的價值在於：

在《金瓶梅》裡，才開始寫出了具有特定歷史階段（封建社會崩潰期）的時代特徵的人物，才開始寫出了在那樣腐爛的封建社會典型環境下一些人物的必然活動。……我不是說這部作品沒有缺點，例如理想成分的極端稀薄，對農民起義的輕描淡寫，對人民的積極力量彷彿看得無足輕重，以及過多的色情描寫等，如果專就其中的某一方面論，也可以說它是自然主義的作品，然而它的現實主義的成就還是主要的，而且在揭露現實的深刻性上和描寫規模的宏大上遠遠超過了以前的現實主義的作品。²⁰

李長之以「寫出了典型環境下一些人物的必然活動」評價《金瓶梅》的觀點，與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對「現實主義」的經典詮釋：「據我看來，現實主義的

¹⁷ 在這次反思進行之前，胡風已於 1954 年發表過《意見書》，將「追求生活的真實與藝術的真實」視為現實主義「根本性質的前提」，因此質疑在「現實主義」上又加上「社會主義」的必要，然而胡風隨即遭到批判與整肅。因此「政策鬆綁」，成為百花時代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重新反思的主要因素；但卻非唯一因素。當時蘇聯文學的「解凍」，使蘇聯文學批評開始重視「真實性」，對中國的文學批評也直接造成影響。參見洪子誠，《當代文學概說》（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2000），頁 27-30；《1956：百花時代》，頁 172-74。

¹⁸ 參見《1956：百花時代》，頁 178-79。

¹⁹ 李長之所謂「狹義的現實主義」，亦即：「……它不是指作品中對現實的一般關係說，也不是指現實主義作品的共同點說，而是指特定的歷史階段的產物。具體地說，是帶有鮮明的、近代的，亦即具有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才可能產生的觀察方法和描寫方法的產物，並且指作為一個流派看，它能更鮮明地區別於浪漫主義流派的作品。它也能區別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它雖然可能真實地、具體地、歷史地反映現實，但是它不可能根據正確的科學世界觀，用社會主義精神來教育人民。」見李長之，〈現實主義和中國現實主義的形成〉，《文藝報》1957 年第三期（1957 年 4 月），頁 11。

²⁰ 〈現實主義和中國現實主義的形成〉，頁 11。

意思是，除了細節的真實外，還要忠實地表達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²¹，相當接近。李長之根據此一論證文學作品是否為「現實主義」的判準，認為《金瓶梅》能夠深刻揭露現實，而且描寫規模宏大，因此「遠遠超過了以前的現實主義的作品」。李長之還認為，《三國》、《水滸》中的人物雖然也是「由現實人物中概括出來的藝術形象」，但「究竟不完全是現實中容易遇到的人物，甚而無寧帶有半神話的性質」，不若《金瓶梅》的主要人物「確是封建社會的地主惡霸家庭中真正的現實人物」；而且這些人物是「創造性地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水滸》、《三國》則是在「人物創造上還不免有類型的痕跡」。²²由此可知，李長之相當重視《金瓶梅》中「揭露現實」、「反映現實」的成就，也希望跳脫「類型化的英雄人物」的窠臼。他並不以《金瓶梅》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作品，對「現實主義」範圍的認定也比較廣闊，肯定「非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現實主義」的存在，不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為唯一的文學評論規範。這些觀點的形成，與「雙百」時代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權威地位的反思，十分相關。²³

隨著「反右派運動」開始，李長之的觀點於 1957 年第三十八期《文藝報》刊登的〈《水滸》和《金瓶梅》在我國現實主義文學發展中的地位〉一文中，遭到李希凡的批評。²⁴李希凡認為李長之否定《水滸》、《三國》等書為「現實主義」的理由，可以分作兩個問題研究：一、現實主義人物創造問題；二、反映時代的範圍問題。對「人物創造問題」，李希凡的意見是：

……真正的現實主義作品，不排斥理想也不排斥誇張（不能把帶有一些理想色彩的作品，都稱作浪漫主義），……像毛主席所說的：「文學作品反映出來

²¹ 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在中國的接受與轉換》，頁 36。李長之於後文中亦論及：「嚴格的現實主義之包括細節真實、典型環境下的典型性格的真實，既區別於一般的現實主義，又不同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見〈現實主義和中國現實主義的形成〉，頁 13。

²² 〈現實主義和中國現實主義的形成〉，頁 11。

²³ 實際上由於李長之在此一反思運動中的看法與秦兆陽等人較為接近，因此亦被批評為右派份子。見《中國當代文學史》，頁 46。

²⁴ 李希凡於文章中開宗明義寫道，自己是「讀了《文藝報》第三號上李長之的〈現實主義和中國現實主義的形成〉，很想寫一些意見來參加討論」。見李希凡，〈《水滸》和《金瓶梅》在我國現實主義文學發展中的地位〉，收入《論金瓶梅》，頁 273。

的生活卻而且應該說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如果文學典型失去了這種高度概括的藝術魅力，只是一些「現實中容易遇到的人物」，它也就不會有強烈地打動人心喚起人們美感的作用。²⁵

由引文可知，李希凡是以毛澤東的〈講話〉，作為判斷文學作品是否為「現實主義」的標準。因此他認為「真正的現實主義作品」應該不排斥「理想」及「誇張」，而《水滸》中「洋溢著人民對於英雄的美的理想」，符合毛澤東對文學應該寫「生活的光明面」，「注重塑造先進人物和英雄典型」的規範，因此具有「高度概括的藝術魅力」，能夠喚起美感的作用。這裡所謂的「典型人物」，並不包括「現實中容易遇到的人物」，而應該是「比生活更高，更強烈，更理想」的「英雄典型」。李希凡對「現實主義」的詮釋，實際上就等同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而且他所謂的「現實主義」，並不包括李長之所謂「反映現實」的「現實主義」。因此他才會質疑李長之既然已經看到《金瓶梅》「理想成分的極端稀薄」，卻仍然認為《金瓶梅》「現實主義成就還是主要的」的情形：「不能不使人懷疑，李長之所注目的我國文學現實主義的主要傳統，究竟是什麼了」。在上述背景下，李希凡不僅認為《金瓶梅》沒有「銘刻人心的鮮明典型」，而且它對「腐化、墮落」表現出「欣賞」的態度，不符合「偉大現實主義作品」的特徵，亦即不具有暴露黑暗時能夠「喚起人們對於不合理制度的正義的反抗」的寫作目的。即使《金瓶梅》具備恩格斯所謂「細節真實」的特徵，也因為它「沒有烘托出幾個成功的典型」，因而細節描寫無法增加作品的「藝術魅力」。²⁶

相對於鄭振鐸及吳晗雖然對「現實主義」理解不同，但皆以《金瓶梅》為「現實主義」作品的共識，「雙百」時代對「現實主義」的理解，分歧更大；因此李長之及李希凡評論《金瓶梅》時，才會對「《金瓶梅》是不是現實主義作品」出現相悖的看法。李希凡對李長之的批判，可以作為這個現象的總結：「李長之所以這樣貶低《三國演義》和《水滸》的價值，抬高《金瓶梅》的現實主義成就，這也不簡單是具體作品評價上的分歧，而是對於現實主義文學和中國現實主義文學傳統

²⁵ 〈《水滸》和《金瓶梅》在我國現實主義文學發展中的地位〉，《論金瓶梅》，頁 278。

²⁶ 以上引文見〈《水滸》和《金瓶梅》在我國現實主義文學發展中的地位〉，《論金瓶梅》，頁 278-79、281、283、285-86。

的理解和看法上，和一般人有所不同。」²⁷這段話很清楚地指出，評價《金瓶梅》是否具有「現實主義」的成就，其實是「雙百」時代知識份子表達自己質疑或贊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此一意識型態的途徑之一，而不只是「具體作品評價上的分歧」；而且在李希凡將李長之分爲和「一般人」不同的一方時，也可以看出這種「分歧」背後的政治意涵²⁸，以及當時「左派」又逐漸抬頭的政治氣候。²⁹

²⁷ 〈《水滸》和《金瓶梅》在我國現實主義文學發展中的地位〉，《論金瓶梅》，頁 283。

²⁸ 實際上就目前所見，1957 年 1 月發表的兩篇與「現實主義」相關的金學研究論文，看法都與李長之比較接近，亦即認爲《金瓶梅》是「暴露黑暗」的「現實主義作品」；因此李長之並非李希凡所謂的「和一般人不同」。參見李西成，〈《金瓶梅》的社會意義及其藝術成就〉，原刊《山西師院學報》1957 年 1 月號，後收入《論金瓶梅》頁 186-203；張鴻勛，〈試析《金瓶梅》的作者、時代、取材〉，原刊《蘭州大學學生科學論文集》（人文），1957 年 1 月，後收入《論金瓶梅》，頁 83-93。不過這兩篇文章各有其不同的寫作目的，在「現實主義」上的著墨不若李長之及李希凡二人。而且李長之及李希凡的文章不僅在內容上政治意味較爲濃厚，他們發表的刊物《文藝報》，在「雙百」時代也較有政策上的代表性，參見《1956：百花時代》，頁 135；因此在文章的性質及解讀方面也較易引起政治上的聯想及爭議。

²⁹ 在此要補充說明的是，雖然李希凡認爲《金瓶梅》不符合毛澤東對「現實主義」的定義，但是毛澤東本身對《金瓶梅》卻相當推崇。毛有關《金瓶梅》的言論，集中在 1957 年至 1962；1961 年 12 月 20 日〈在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區第一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及了他大部分的觀點：「你們看過《金瓶梅》沒有？我推薦你們看一看，這本書寫了明朝真正的歷史。暴露了封建統治，暴露了統治和被壓迫的矛盾，也有一部份寫得很仔細。《金瓶梅》是《紅樓夢》的祖宗，沒有《金瓶梅》就寫不出《紅樓夢》。《紅樓夢》寫的是很仔細很精細的歷史。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雖然毛在 1962 年 8 月中央工作會議核心小組的一次談話中也指出：「《金瓶梅》沒有傳開，不只是因爲它的淫穢，主要是只暴露黑暗，雖然寫得不錯，但人們不喜歡看。」但 1957 年毛澤東確實對推廣、印行《金瓶梅》有所作爲，認爲「各省委書記可以看看」，因此中宣部、文化部會與出版部門協商之後，在當時任文化副部長的鄭振鐸主持下，以「文學古籍刊行社」的名義，按 1933 年 10 月，「古佚小說刊行會」集資影印的影印本，重新影印了兩千部；發行對象是各省省委書記、副書記、以及同一級別的正、副各部部长以上職務的領導。這種小範圍的開禁，多少解除了當時對《金瓶梅》的顧慮。毛於 1955 年也提及出版金瓶梅刪節本的構想，然因政治運動未果；60 年代毛向周揚重提此事，因此點校者於 1960、61 年中，分兩次交來全稿。但之後因批判「全盤繼承論」及文化大革命，又遭擱置，文革中校稿亦被抄沒，直至 1977-78 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才繼續刪節本的出版工作。雖然毛澤東對《金瓶梅》的讚賞與推廣仍然受政治活動左右，但他對《金瓶梅》的評價，也使部分研究者認爲毛與「金學研究的高潮」是分不開的。參見陳晉主編，《毛澤東讀書筆記解析》（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頁 1417-19；蔡瓊，〈毛澤東論《金瓶梅》及其對研究的意義〉，

三、 金學研究中的「現實主義」與「自然主義」之爭

1957年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爭辯因毛澤東提出「兩結合」告一段落後³⁰，文化大革命等各種政治運動接踵而來，使中國的金學研究在1964-1978年呈現「一片空白」；直至1979年，朱星、黃霖等人才又開始發表相關論文。³¹進入八零年代以後，文學界出現對「現實主義」的反思與檢討，此一思潮也在金學研究中造成影響，形成「《金瓶梅》究竟是現實主義或自然主義」的爭論。在此一爭論中，徐朔方是以《金瓶梅》為「自然主義」的代表，其餘大部分論者皆認為《金瓶梅》是「現實主義」，或者「帶有一點自然主義的現實主義」。

如前所述，由於五〇年代以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一直在文學政策上佔有主導的地位，此一主張贊同的又是「有前提的真實」：也就是「合於政治思想傾向的真實」；因此胡風及秦兆陽等人重視文學「反映生活及藝術真實」，和質疑「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時，便遭到批判，使得「文學的真實性」在文革結束之前，一直是有其政治意涵及規範，而且在知識份子間諱莫如深的論題。隨著文革結束，1979年下半年開始，文藝性刊物上出現了大量關於「文藝真實性問題」的討論，強調文學「反映真實生活」的重要性。³²這些討論一方面解除五〇年代以來政治對文學的限制，並且重新確定文學的性質，平反某些被誤解的觀點；另一方面也可將這些「反思」解釋為現實主義文學解除「文革」期間的政治束縛，回歸到「五四」傳統。³³

雖然在反思現實主義的潮流下，文學似乎掙脫了文革時期的束縛；但是一直要到八〇年代末期，「自然主義」、「形式主義」等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曾經排斥的創

《毛澤東思想論壇》1994年第二期，頁63-65；孟進厚，陳昌恆，〈論毛澤東對《金瓶梅詞話》的評價〉，《華中師範大學學報》1997年第六期（1997年11月），頁106-11。

³⁰ 此一論爭直到毛澤東於1958年下半年提出「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口號才平息下來。參見《1956：百花時代》，頁179-80。

³¹ 參見吳敢，〈20世紀《金瓶梅》研究的回顧與思考（上）〉，《棗庄師專學報》2000年第一期（2000年2月），頁5。

³² 參見張德祥，《現實主義當代流變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頁208-12。

³³ 參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在中國的接受與轉換》，頁386。

作手法，才開始為文藝界所接納。³⁴其實早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成為主導思潮之前，知識份子便已對「自然主義」存有某種程度的偏見。對於二〇年代的梁啟超、茅盾、郁達夫而言，「寫實主義」（不同於現實主義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和「自然主義」是很接近的，都有「僅能客觀而赤裸地描述（或者暴露）現象，無法展現人的『靈性』和自由意志」的問題。至三〇年代瞿秋白譯介恩格斯論及現實主義的信件時，則接受恩格斯的看法，將左拉（通常被歸為「自然主義」作家）的作品視為「曲解階級鬥爭的現實動力」的「更加調和的現實主義」。上述兩種批評，說明自然主義只「反映客觀現實」，無法「體現主觀意志」的「缺陷」。³⁵至五〇、六〇年代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當道時，自然主義更被視為「在揭示生活的『本質』上存在缺陷」。³⁶

孫遜於 1980 年發表的〈論《金瓶梅》的現實主義成就及其嚴重缺陷〉，大部分立論基礎可謂與當時反思「現實主義」的潮流相呼應；但也可以看出，受到前述對「自然主義」之批評，以及某部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影響，他仍然將「自然主義」視為遜於「現實主義」的文學主張。在上述背景之下，他認為：

如果說，藝術的生命在於真實，……在這方面，《金瓶梅》正以它「無條件的、直率的真實」，為我們複製、再現了整整一個時代，從而顯示了我國古代現實主義文學所已取得的高度成就。³⁷

孫遜強調的「無條件的、直率的真實」，正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當道時「有條件的真實」形成對比，表現了當時文藝界對「真實性」的重視。他在〈論《金瓶梅》的思想意義〉一文中，也有類似的看法，而且對現實主義的理解及對《金瓶梅》的評論，更接近五四時期的吳晗。³⁸孫遜也重新肯定李長之受到批評的觀點，認為

³⁴ 參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在中國的接受與轉換》，頁 391。

³⁵ 參見《寫實與浪漫—科學主義視野中的「五四」文學思潮》，頁 87-92、109-10。

³⁶ 見《中國當代文學史》，頁 21。

³⁷ 孫遜，〈論《金瓶梅》的現實主義成就及其嚴重缺陷〉，《學術月刊》1980 年第 11 期（1980 年 11 月），頁 65。

³⁸ 孫遜在該文中評論道：「《金瓶梅》是一部具有深刻思想內容的現實主義文學巨著。它以真實的筆觸，廣闊地展示了它所屬的那個時代的風貌，深刻而全面地暴露了晚明社會的黑暗與罪惡；……

《金瓶梅》是「我國第一部以現實生活為題材的小說」，而將《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歸為「歷史小說和神魔小說」³⁹；這些觀點都與當時文藝界「反思」的思潮十分相關。但是在〈論《金瓶梅》的現實主義成就及其嚴重缺陷〉文末，他以「嚴重自然主義傾向」，指出《金瓶梅》的「缺陷」：

自然主義用生物學的觀點來看待人和一切社會現象。在他們筆下，不管是什麼階級的什麼樣的人，都是庸俗的、醜惡的；似乎人類沒有任何美好的理想，有的只是獸性和瘋狂；生活中也沒有任何詩意，有的只是罪惡和黑暗。因而他們的作品雖也暴露了舊社會的黑暗，但作品中表現出來的頹喪情緒和庸俗趣味卻容易腐蝕人們的靈魂。《金瓶梅》的嚴重缺陷正表現於此。⁴⁰

在這段文字中，「自然主義」被描述為雖然「暴露了舊社會的黑暗」，但也表現出「頹喪情緒」和「庸俗趣味」的一種文學思潮；因此孫遜在後文論及，具有這種特徵的《金瓶梅》帶來了「深刻的教訓」，也「啓示我們」，「現實主義並不排斥理想，相反它需要用理想去照徹現實」。雖然孫遜也認為現實主義「不一定要寫理想人物」，但是他更認同現實主義應該表現「對美好人生的希望與追求」。⁴¹

孫遜站在「現實主義」立場上對「自然主義」及《金瓶梅》的批判，與 1957 年李希凡站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立場上對《金瓶梅》的批判，其實相當接近；只是此時孫遜先肯定《金瓶梅》「反映真實」的成就，再將李希凡所謂《金瓶梅》「失去了愛憎分明的理想的熱力，失去了現實主義者的詩的生命」的「缺陷」

無可辯駁地證明了；這個社會已經爛透了，一切都無可挽救了；它以及附屬於它的階級，它們除了滅亡，不會有也不配再有更好的命運。這一切，都正是《金瓶梅》所取得的傑出的成就，也是現實主義在我國文學發展中的勝利。」見孫遜，〈論《金瓶梅》的思想意義〉，原刊於《上海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0 年第三期，後收入《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編輯部編，《金瓶梅研究》（江蘇：復旦大學出版社，1984），頁 31-39；引文見頁 38。

³⁹ 以上引文見〈論《金瓶梅》的現實主義成就及其嚴重缺陷〉，頁 65。

⁴⁰ 見〈論《金瓶梅》的現實主義成就及其嚴重缺陷〉，頁 71。

⁴¹ 以上引文見〈論《金瓶梅》的現實主義成就及其嚴重缺陷〉，頁 72。

⁴²，歸因於《金瓶梅》的「嚴重自然主義傾向」。由此可知，在孫遜眼中，雖然《金瓶梅》表現了「無條件的真實」，但他還是認為「優秀的現實主義作品」中的「真實」是「有條件的」，亦即應該表現出對理想的追求。此後意圖論證《金瓶梅》是「現實主義作品」的論者，多數也都提及了《金瓶梅》「缺乏理想」或者「描寫繁瑣」的「自然主義傾向」；但其中只有少數論者與孫遜相同，對《金瓶梅》的「自然主義傾向」持批評的態度⁴³，多數論者都認為《金瓶梅》根本不是自然主義的著作⁴⁴，或者試圖以「瑕不掩瑜」的角度，調和《金瓶梅》中自然主義與現實主義的關係⁴⁵。但是無論是否直接在文中批評「自然主義」，這些論點都存在共通之處，亦即論者皆對「自然主義」抱持負面看法，認為只有論證《金瓶梅》在「現實主義」上的表現，才能肯定《金瓶梅》的價值；因此才會意圖透過列舉《金瓶梅》中「批判現實」，甚或「表現理想」的證據，批評或否認《金瓶梅》的「自然主義傾向」。

徐朔方是少數正面宣稱《金瓶梅》為「自然主義作品」的論者之一。但實際上他的論點與上述以《金瓶梅》為「現實主義作品」的論者十分接近，亦即對《金瓶梅》中「反映社會的貢獻」，抱持肯定的態度。但是徐朔方也認為：

以描寫反面人物為主的《金瓶梅》，誠然不能要求它大量描寫積極向上的事物，但是只要作者有心，……不是也可以令人耳目一新嗎？……《金瓶梅》自然主義傾向的主要表現是它的客觀主義，即由於過份重視細節描寫而忽視了作品的傾向性。……對社會黑暗的詳盡描寫不等於是暴露。暴露應該同批判的態度結合在一起。在同一枝生花妙筆下，批判的立場越是鮮明正

⁴² 見〈《水滸》和《金瓶梅》在我國現實主義文學發展中的地位〉，《論金瓶梅》，頁 287。

⁴³ 例如杜維沫，〈談談《金瓶梅詞話》成書及其他〉，原刊《文獻》第七輯，1981年3月；後收入《論金瓶梅》，頁 67-75。

⁴⁴ 例如孟昭璉，〈《金瓶梅》對中國小說思想的變革〉，收入杜維沫，劉輝編，《金瓶梅研究集》（濟南：齊魯書社，1988），頁 120-36；周中明，〈現實主義，不容抹煞一評《金瓶梅》是「自然主義的標本」說〉，收入氏著，《金瓶梅藝術論》（台北：貫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0），頁 92-125；于承武，〈史筆〉，收入氏著，《金瓶梅平議》（北京：文津出版社，1992），頁 67-78 等。

⁴⁵ 例如鄭慶山，〈現實主義還是自然主義？〉，收入氏著，《金瓶梅論稿》（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頁 16-31。

確，暴露也就越深刻有力。……除客觀主義之外，《金瓶梅》自然主義的另一個重要表現是它的描寫很少由表及裡，深入本質。……《金瓶梅》的這些描寫，……算得上社會病態和怪現象的羅列，卻不能算是本質的揭露。⁴⁶

徐朔方對「積極向上」、「傾向性」、「立場」、「本質」的重視，以及對「過份重視細節描寫」的批判，其實和其他論者對「自然主義」的批評相當類似，甚至可以說他的立場和孫遜、杜維沫等批評《金瓶梅》有其「缺陷」的論者並無二致。從這個角度看來，八〇年代金學研究中的「現實主義」與「自然主義」之爭與五四時期及五〇年代性質並不相同，因為在八〇年代的思潮背景下，論者對「現實主義」的理解已經逐漸取得共識；但是，雖然他們認同能夠「反映現實、表現理想並進行批判」的「現實主義」，卻都認為「無法表現理想」的「自然主義」是一種「缺陷」。也就是說他們心目中的「現實主義」其實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相同，有其必須遵守的要件，並非毫無限制的「真實」。因此雖然他們透過「真實性」的辯論及確立，掙脫了文革時期政治對文學的限制，甚而可以說在「精神上」有「回歸五四」的現象，使藝文界處於較為開放的氛圍中；但在金學研究的實踐上，論者卻仍然保持著「重現實主義」而「輕自然主義」的意識，使八〇年代金學研究所謂「現實主義及自然主義之爭」其實並未出現對立的意見，反而一面倒地呈現出對自然主義的批判。

八〇年代金學研究中「現實主義」及「自然主義」的論爭始於文革後思想的開放，也因九〇年代初期中國文藝界對各種文學思潮更開放，接受度更高的態度而結束。在此一論爭中，評價《金瓶梅》時「改革社會」或「表達政治立場」的實用目的，已較五四時期及五〇年代明顯減少；但是綜上所述可知，歷史背景使論者產生對文學思潮既有的成見與判斷，迄今仍左右金學的研究與評論；肯定或否定《金瓶梅》中「現實主義」的表現，以及鑑定《金瓶梅》中有無「自然主義」的成分，始終是評論《金瓶梅》藝術價值的準則。

⁴⁶ 見徐朔方，〈論金瓶梅〉，原刊《浙江學刊》1981年第一期，後收入《論金瓶梅》，頁137-57；引文見頁145-53。